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七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二期 ——
（二〇〇三年六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6a）

【史海钩沉】“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	莽东鸿
【研究评论】小议对文革的批判与反省	青近军
【往事如烟】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冯骥才
【童年纪事】众神的嬉戏	朱大可
【亡灵祭坛】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	
——读《陆兰秀狱中遗文》	钟沛璋
丁群和《陆兰秀狱中遗文》	丁 东
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陆兰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

• 莽东鸿 •

“九一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事件发生后，尽管国外传媒就中国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及中国净空禁飞等事议论纷纷，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我国的报刊、广播等传媒，在党中央“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未对此事作任何反映。

在初期阶段，我国传媒还故意造成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国内政局没有变化的假像。如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期画报的封面图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合影；10月6日，中央照常以非常隆重的仪式，迎接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皇帝……。

◇ 尽管中央严密封锁消息，但“小道消息”仍很快扩散到全国

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9月14日，从下午4时开始至次日下午4时，周恩来向政治局委员，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分批通报林彪叛逃坠机死于蒙古的消息。

9月18日，中共中央以《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57号文件），向全国省、部、军级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通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国叛党，自取灭亡”等情况。另外，周恩来还专门向民主党派负责人作了通报。

9月23日，向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传达中央57号文件。

9月28日，通知要求将中央57号文件扩大传达到地、师级以上党委。

10月3日，外交部等部门传达中央57号文件。

10月6日，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在一定范围通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的阴谋。

10月中旬，中央57号文件及10月6日的《通知》向全国各地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军内连级党员干部、空军的空、地勤人员传达。后来传达至普通党员。

10月24日，发出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

11月14日，印发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

12月11日，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党内讨论。

1972年1月13日，发出《通知》，将“材料之一”的传达，扩大到党外，并下发“材料之二”。同日，中央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编印发给党内高干“供批判用”。

7月2日，发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另发批判陈伯达的材料。

尽管如此，当时还没有得知事件消息的有心人，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中央取消了每年国庆节必有的游行检阅（尽管以“节约闹革命”为借口通知说此后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国庆节当天的报纸没有刊载林彪的图片；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国庆节期间以及此后的国事活动报导中，全部销声匿迹。同时，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导中，包括赞颂毛泽东与批判刘少奇的报导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在中央文件向全国人民传达后，《人民日报》从12月开始，出现了批判搞阴谋诡计、两面

派，批判“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文章；1972年2月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批林”方面开始比较直接，如批判学马列“走‘捷径’”以及批判“离开路线讲政权，离开路线讲‘夺权’，满口‘权、权、权’，疯狂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对林彪公开、大规模的批判，是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开始的。

很明显，当时被宣传为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竟然要“谋害伟大领袖”、“叛国投修”，这个特大新闻，像原子弹爆炸一般，震惊了全国。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件层层传达过程中，尽管消息封锁严密，但这个惊人的信息，仍然飞快地以各种方式向尚未听到传达的自己信任的“最可靠的人”泄漏出去，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小道消息”很快就扩散到全国，包括被罢官、“靠边站”，以及被监护、蹲“牛棚”甚至被关在监狱、劳改农场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陈毅是在9月13日当天知道的一一那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议事。会议完毕，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赶到301医院，将这个绝密信息，向陈毅报告。但他却又不肯明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劳动，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这位在林彪死去4天就知道消息并敢于向她通风报信的人，当然是属于能从高层获知重要信息的非一般百姓。

◇ 首都的重要单位以“突出毛主席”为由，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

在中央文件传达的时候，对毛泽东、林彪都十分虔诚的广大干部、群众，无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些人开始时甚至难以接受。

10月17日，中央文件传达传达到位于河南省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在干校当猪倌的何金铭这样讲述：传达“一开始便使人震惊，甚至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林副统帅出问题了？而且是大得难以想象的问题，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我们每个听传达的人，都静静地听，只恐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两天下来，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关于林彪的种种罪行，也装满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谜语，许多问题是一锅糨糊，搞不清楚了”。

当时在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劳动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回忆中央文件传达时的情景：“在9月中旬之后，北师大军宣队有人到临汾向师大教师传达，时间是在晚饭后。传达的事情多了，人们照例并不注意听。有的小声和‘邻居’说话，有的在半睡状态中休息。劳动一天，也该休息了。等听到‘林彪’、‘飞机’、‘摔死’，大家都惊醒了，耳朵竖起来。真如晴天霹雳。”

9月20日奉命回国向中央报告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10月3日参加了外交部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他这才知道自己带回国向周总理汇报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飞机残骸，竟是林彪等人的遗体 and 座机。他当时感到：“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闻讯后也不敢相信，惊问告诉她消息的好友：“真的？”

在成都狱中陪伴胡风的梅志在学习了中共“十大”文件后，还不太相信林彪的叛逃：“怎么几年后却成了叛逃分子？他的‘九大’报告中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啊！”

作家杨沫在当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爆炸性新闻，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真是富有戏剧性——写入党章成为毛主席接班人的人，竟然要杀害毛主席，竟然要带着机密文件叛逃外国……在这样残酷的事实面前，人们目瞪口呆；同时，也自然喟然长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真是多灾多难，怎么得了啊？……”

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在日记中写道：10月25日“党员听非常事件的报告”；28日下午“传达中央文件”；此后多天教师们对文件的讨论，他都没写出林彪的名字，均以“××”和“×贼”代替。

笔者当时所在单位吉中地质大队的群众在听文件传达时，静寂无声。传达后，大家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这种种现象，都反映了人们既震惊而又痛苦、无奈的心情。

首都的重要单位以“突出毛主席”为由，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这当然使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北京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1971年9月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当时，有的办公室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我预感出了大事，但没有一句质疑。‘文革’已经使我得到了‘言多必失’的惨痛教训。”当晚，吕大渝就赶到她的中学好友孙文冬家打探消息，从孙的丈夫李观承那里，得知是林彪出了事。

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在中央文件传达前，不少人已从各种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北大荒劳动的北京知青祝祁是从一位路过的齐齐哈尔知青那里，得知了“九一三”事件。这位知青在讲了以后又嘱咐祝祁：“可不能传给别人，这事非同小可。”祝祁答：“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告诉别人。”次日，祝祁却告诉了他最要好的同学，同时还叮嘱同学：“千万不能外传。”这位知青同样信誓旦旦：“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不外传。”但是没过多久，大伙儿都知道了。

听到过“小道消息”的许多知青，在中央文件正式传达的时候，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仍然非常震惊。曾在崇明岛插队的知青赵丽宏记述：“会场里静得出奇，只有传达这消息的公社干部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所有的人都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互相不敢交换一下眼神，只是将目光直直地盯着台上那位公社干部。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小姑娘，吓得哭起来……”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庞大的256号三叉戟带着震耳的轰鸣声，在漆黑的夜空，以500米的低空高度从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由南向北掠过，飞进蒙古境内。这给当地正在举行露天晚会的知青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目睹的是“九一三”事件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

“九一三”事件在百姓中的流传，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变形。据说，有些地方以讹传讹，将事件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谐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临走时还把马克思的皮大衣给偷走了，又带着老婆一大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给跌断了。”

由于中央文件分层次与分类传达产生的“时间差”，在有些单位还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一些不知情的革委会非党员干部或非党员造反派头头还继续虔诚地高声领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谣言”的行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公安机关的追查。

◇ 作家沙汀发觉“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

没有直接消息来源的被关押、被监督改造的“反党分子”“走资派”，有的根据报纸、环境分析，有的从各种特殊渠道得知了消息。

当时被“监护”的罗瑞卿大将、王平上将，分别从国庆节期间的报纸分析，得出北京或林彪等人“出事”了看法。后来，王平又从来探访的儿子晓光处知道林彪摔死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被抓起来了。

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改造的剧作家陈白尘，在1971年国庆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昨晚无社论，今日收听广播，天安门亦无游行，是解放以来所未见，甚为纳闷。岂首都发生什么变故？想到南京家书中的备战说，怀疑更深。大家也都惊异，但未议论。”11月初，根据党员活动的紧张、神秘气氛，他猜测：“一定党内发生了重大问题。联系国庆节的情况，而且某些显贵多日来未曾见报，不免生疑。”

被关在北京什坊院“特监”的黄克诚大将因患重感冒住进医院。他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时，“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在湖南汉寿县一个部队农场劳动的秦基伟上将，是从营部陈医生那里得到消息的。1971年初冬的一天，陈医生悄悄告诉他：“老秦，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吓着。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阴谋刺杀毛主席。事情败露后他带着叶群、林立果坐飞机逃往苏联，结果飞机掉下来，他们都摔死了。”“这是上面传达的，绝对可靠”。

被关在成都昭觉寺的四川省与成都市的高干们，得知“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是很偶然的一作家沙汀（西南文联主席）在10月发觉“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他感到奇怪，后来同狱的“郭付仁的家属探监时（将“九一三”事件）偷偷告诉了郭。杜心源臀部生疮，卫兵（看守）不愿替他擦药，喊郭来干。于是，林彪摔死的消息才传开。”

1972年1月初，彭德怀元帅被“传讯”时，专案组向他宣布了林彪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受到了极大震惊，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

蒙冤于秦城监狱的囚徒们得知“九一三”事件消息，有的来自审讯者，有的是从报纸上分析出的，更多的人则是在狱中播送十大闭幕消息时才知道的。唐有章（农机部农机科研院副院长，1928年与叶剑英等人同赴莫斯科学习）、师哲（原山东省委书记，前毛泽东政治秘书）是从审讯者口里知道的。

唐有章回忆那次审讯的情景：“还是公安部的那位同志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消息：林彪是个大坏蛋’，我听了大吃一惊，林彪是写进党章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呀！因此，我说没有见到中央文件之前，我不理解你们来搞什么名堂。他又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揭发和批判林彪，叫我也帮助进行揭发，提供材料。”

师哲回忆：“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竟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

被监护在通县军营的伍修权，从报纸上发现林彪出了问题。不久，专案组在询问林彪问题时，为了消除他的顾虑，说：“你现在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林彪已经成了一个大坏蛋，有什么你就只管说吧！”

萧华则是在事件发生后的8个月即1972年5月，才从来访的子女处得知消息的。专案组事先向萧华子女提出了“三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讲林彪事件”。萧华儿子先在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利用搀扶萧华上厕所的机会，偷偷给父亲看（后面仍然跟有专案组人员监视）。

◇ 得知事件消息的人们，在震惊之后，对于林彪之死，普遍表示高兴，“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高干们尤其如此

被专政的许多“牛鬼蛇神”，得知“九一三”事件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被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锦江饭店董事长兼经理董竹君，从狱中情况的突变，发现“出了大事”：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半步桥监狱集体放风，囚徒们突然发现，圆厅里所贴的标语、毛主席语录全都不见了；次晨，林彪的再版前言也不让背诵了，看守还告知他们将《毛主席语录》上的这页撕去，查出不撕毁者还要受处份。

董竹君回忆：“平时严格督察认真背诵，突然又要取消，大家奇怪。这一来，犯人的思想情绪大波动。有人猜测说：‘这回也许出大事了。’——大家各执己见，议论纷纷，我则觉得外面形势是在经历一场大变动，脑海沉浸在沉思中，一言不发。”

在江西峡江县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干校被监督劳动的“反党分子”李建彤（小说《刘志丹》作者）去了一趟市场，返回干校后，突然发现干校院子里写在红砖墙上的林彪语录全都被涂掉了，摹仿林彪笔迹书写的“四个伟大”，也被厚厚的红色油漆遮盖。她连忙问一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外面那些语录都给涂掉了？”“你现在不要问，他们不让告诉你，过些日子你就会知道了。反正是发生了特大事件，他们想瞒也瞒不住。”

远在新疆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诗人艾青，到连队食堂参加群众大会。当指导员宣布传达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时，会场上立刻响起了：“地富反坏右滚出去！”“艾青滚出去！”“中央绝密文件不许你们听！”的声音。在众目睽睽之下，艾青低着头走出了会场。后来，一位老农工私自把文件拿给艾青看，被发现后，这位农工成了“泄露中央机密的反革命罪犯”，遭到残酷的审讯。

关押在一个小海岛上服刑的一批国民党特务，在9月13日当天，凭着职业的敏感，就觉得“上层出了大事”：每天定时从海岛上空飞过的多次民航航班，突然都没有了。此后他们在露天劳动时，都心不在焉，不时仰望晴朗的天空，静听飞机的声音。

得知事件消息的人们，在震惊之后，对于林彪之死，普遍感到高兴，“文革”中受迫害的高

干们尤其如此。

叶剑英提笔写了一首《斥林彪》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9月13日晚，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兴奋不眠，便到邻居乔冠华家饮酒畅谈，乔冠华赋诗一首：“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9月14日，包括朱德元帅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将领第一次听到林彪昨夜摔死的消息。沉寂片刻之后，人群中爆发出欢腾的场面，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激动得晕了过去，更多的人则泪流满面，含泪大笑。朱德激动地连连说：“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驻法大使黄镇与国内来法通知他“九一三”事件的符浩，在巴黎举杯庆贺：“为‘死有余辜’乾杯！”黄镇回国看望陈毅时，陈毅在病床上高举茅台酒说道：“伟大的胜利！”黄镇永远忘不了当时陈毅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

罗瑞卿高兴得几晚没有睡着觉，后来，他还写了13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另外，他在《答友人》诗中写道：“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病中的邓子恢是在病房听中央来人传达的，他立即兴奋异常，病情也似乎减轻了许多。

张云逸（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欣喜若狂，喝了个一醉方休，把手杖也扔了：“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还要出一把力。”

王平感到：“尽管是一个迟到的消息，仍然使我高兴得激动不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秦基伟觉得“心上又好像掉了一块石头，有些疑虑也好像找到了答案。原来林彪是野心家，想篡党夺权，难怪把那么多的将帅整得那么惨。”

在粤北黄陂干校，各个连队开会讨论的时候，已被“解放”当炊事班长的作家秦牧，一个人一夜炸了100多斤鱼。

在南昌郊区被“监护”并在当地工厂“劳动锻炼”的邓小平夫妇，是在1971年11月3日，在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时才知道的。中午回家，因监视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卓琳则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的手心中写了“林彪死了”几个字。邓榕又急忙到大哥邓朴方屋里，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午饭时，监视人走了，卓琳特意给了邓小平一小杯酒，邓朴方吵着也要，父子俩仰脖痛饮。邓小平当时兴奋、激动，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茅盾一家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竟会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喜的是林彪的死必将引起毛主席的深刻反思，中国的政局可能由此向好的方面变化。茅盾儿子韦韬则庆幸自己头上那顶“反林副主席”的帽子将不摘自落。

1971年国庆节之夜，得知“九一三”事件的罗瑞卿的几个子女，齐聚于华灯齐放而游人寥寥的天安门广场，又说又笑——自父亲1965年底出事后，他们多年没有这样大声地説笑了。

◇ “九一三”事件后，人们的思想普遍出现由悲苦转向欣喜与盼望的新变化

在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在各种会议上继续歌颂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对林彪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但是在暗地里，人们对“九一三”事件产生深层次的思考，许多人开始冷静地对待“文革”。

被战备疏散到广东省肇州的张闻天，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失败。他开始秘密写作，论述社会主义，总结经验教训。后来，这些论文被称作“肇庆文稿”。他写道：“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

邓小平于当年11月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对党做几年工作再退休……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秦基伟预感到：“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中国的政治形势将会有大的变化，说不定不久我们这些人就会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运动初期被打倒、“九一三”事件次日被从农场接到郑州严加看管的原河南省省长、省委常务书记文敏生回忆，当他获悉“九一三”事件后：“我陷入沉思：为什么鼓吹个人崇拜最起劲，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擢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恶果？什么前途？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意味着什么？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的何金铭产生了一系列联想，“这么想下去，不会不想到自己身上来。关我的‘牛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今我已经又是一名共产党员了；那么，当初将我当做敌人对待，不就是弄错了么？”

人们的思想普遍出现由悲苦转向欣喜与盼望的新变化。

朱蕴山（民革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在《点绛唇·晚霞》词中写道：“一片红霞，东风吹暖笼大地。小小乌云，化作轻烟去。指点江山，总是光明路。君记取，晚景辉煌，要勤勤爱护。”表达了他对林彪等人的蔑视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监护中的廖沫沙得知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后，喜悦异常，当即赋诗一首《偶感》：“‘四汉’‘三家’德不孤，秦皇事业化废墟。坑灰未冷心犹热，读尽残篇断简书。”

“文革”前就被遣返原籍在四川一个小镇劳动改造的作家流沙河，那时的感受是：“好痛快哟！左家庄终于闹内乱了！可是第二年又批他的‘右’。这拙劣的玩意儿叫人目笑。后来听说‘黑五类’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这就更加令人齿冷。”

何铨朋填词《鹧鸪天·送林彪》：“一顶万句是谎言，请示汇报纯欺骗。之乎者也红宝书，阿弥陀佛老三篇。计篡党，谋夺权。‘五七一’舰队倾覆，国家主席梦破灭，温都尔汗上西天。”

“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后果，一是广大百姓、干部开始觉醒，“四个无限”、“紧跟”开始打“折扣”，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走入下坡路；二是中央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向缓和方

面做了重大改变，许多被关押在监狱、监护所、“牛棚”或被监督劳动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被解除监禁、管制，并被陆续启用（被怀疑属于“林彪集团”的人，则受到广泛的清查）；三是使毛泽东、周恩来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不过五年，两位巨人先后辞世。

□ 原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4期

~~~~~

# 【研究评论】

## 小议对文革的批判与反省

• 青近军 •

这二十多年来，对文革的批判与反省，其实都不得要领。

那要领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对一段并未全部露出真貌，或并未展示出主要真相的历史，后人的任何批判与反省，都难于有确实积极的意义。

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所读到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原因，我们被告知，就是全来自于进行了地道战、游击战、偷袭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军除了卖国的故事，另外就只有摘桃子的卑鄙行径。至于什么美国的原子弹的威力，百万苏联红军的铁拳，那则仅仅是小小一点的、即便没有也不会影响胜利到来的“外因”而已。

那时，整整一代人，几十年间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概念认识与评价总结，就是建立在这个不完全的历史认知基础上的。

然而，后来，我们知道了，那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打游击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更还有正面战场上的几百万国民党军，而美国的原子弹与百万苏军的进入，更是加速抗战胜利的关键。

今天，我们才真正能对抗战那段历史有了清楚而有益的认识。

因此，我们才会重修那被无知与偏见所毁坏的国民党抗日将士的陵墓，并对他们表示迟来的敬意，而不再视其为“反动派”“反革命”。

而文革的历史，是不是已完全或主要部份都已清楚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了呢？

没有。

二十多年来对文革的种种历史描绘，可以说，都只有局部的、片断的意义，之中，还有不少的更是某种虚构与想当然，甚至是歪曲。

例如，对红卫兵的全过程与全部历史，都弄清了吗？

今天，有多少人知道文革中的红卫兵，虽有着同样的红袖章，而他们之间却可能是性质全然不一样，甚至是属相反？因为初始的红卫兵曾凶残地迫害过他们的老师，就将历史的污水全

部泼向文革出现的所有的红卫兵，这样的片面认识，难道会于后人有益？

有没有人能想到，也许可以将某些红卫兵与八九风波中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划入同一历史行列，即为某种理想勇于热血沸腾者的队伍？又有没有人知道，尚处文革运动之中的红卫兵中，就已出现了对当时政局深表忧虑，而写出《中国向何处去？》、《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重大思考的论文？

再如，“造反派”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她又是如何产生的？她到底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构成，又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势力？她们在整个文革中基本处于何种地位？他们真正是文革的受益者吗？文革中有过的“黑鬼”“右派”的帽子，为何大多曾扣在这些人的头上？——对这些历史中的具体，我们都真搞清楚了吗？

而对于机关学校企业农村中的“政工干部”与“保卫干部”们，其与造反派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对此，你搞清楚了吗？你知不知道今天很多的作品与回忆，之中所描述文革时的造反派整人打人抓人的内容，其实那真正的历史演员，都是各种单位的“政工干部”与“保卫干部”们，而根本与造反派们无涉？

又如，文革初期被迫害的老师，他们到底是死于何人之手？——是什么样的人组成的红卫兵杀害成百上千的老师？

老舍被迫投河自尽，又是受到何种力量的压逼才走上绝路？——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氛围有没有什么不同？而又与1986年的批“精神污染”又有什么差别？有人将此归罪于造反派，但他们不知道，所谓造反派的组织与势力，是在老舍去世后的半年，即1966年底才产生出现的！

发生在湖南广西等地的杀戮数万“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大惨案的行凶者们，又是些什么人？——你思考过的结论往往是：“一定是造反派干的！”而很少会想到，却是人武部、公社党委们策划而由“贫下中农”中的基干民兵们执行的，而那些被害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弟，恰恰是被当作了“要翻天了”的造反派被予以杀害！

而那些被十年八年关进秦城监狱，被打入“五七干校”的老干部与大知识分子们，每日面对的看守们，究竟是些什么身份？而又是由谁指派谁操纵？——现在的说法，很简单，全部归到“造反派”那个烂蓼子。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还如，文革搞了整整10年，而绝大部份省级与省以下的领导干部们，其实，都只有过文革初小段时期内（约两年时间），有过挨批挨斗的经历，而文革中的大多数时期，他们仍然还是大权在握！——对此，我们是否都知道或都已了解清楚？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他们的牺牲，也就是这种时期，而不是什么蒯大富聂元梓猖狂之际！那个时候，以蒯大富聂元梓为代表的造反派头头们，很多也是被下到了大狱。

.....

如果我们对文革的真实，对文革的全貌，尚还不能有真正的了解与认识，而只在那些片断的局部的、甚至虚构歪曲的残缺的历史画页中，去寻求批判与反省，那这种批判与反省的正确意义又能有多大呢？其批判与反省后所得出的结论，又有多少真正的价值？

现在的年轻人，基本都是文革后出生的。他们能看到能理解的文革，就只能是书本、宣传

与作品中的文革。就正如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年轻时，所知道的中国抗日战争，就只理解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辛，而全然不会清楚“国军”也有过的光荣。

现在，大清王朝的历史，已被历史学家们搞得异常清晰了，甚至哪一位新皇帝如何接班的细节，都可以用电视剧清楚地回放表演了。而百多年前的曾国藩、李鸿章到底干了些什么好事与坏事？康有为与袁世凯，他们又有些什么区别与相同点？而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真相是些什么？等等，对这些，现在人们都几乎是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但，发生在当代，还只有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为何却反变得这样神秘朦胧？使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后一代二代人，对文革只能在片断与局部的历史画页中去理解、类比与猜测。

新中国五十四年的历史，很多历史阶段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都已渐浮出水面，让人们了解到真相。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那么一件整人的大事，现在都已大白于天下。为何对这文革历史真相的披露与研究，却依然不能上正式殿堂，而仍只能尘封于故纸，只能让人来迷迷糊糊呢？

因为，这段历史中，并非就只有亿万人民手捧“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的令今人不可思议的画面，也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蒯大富王洪文之类大小造反派在表演，不只是一些大知识分子们用挨批斗受侮辱经历构成故事，之中，更有些“神坛”上的人物，也活跃于这“运动”之内。而在那长达10年的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中，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是谁也无法不会做出点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历史的大小事来的。

鬼们做了坏事，就揭他个通透彻底，批倒批臭。

人们做了些不好的事，则也可视情或重批或轻责。

神们做了，如何办？照实检讨？

检讨好办，可是弊端也很清楚：一是检讨会有损神威，那神位还要不要？二是一神有事，必牵连众神，那可能导致神威不再。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尘封那段会令很多人与神都不快的历史：不提文革，向前看。

可是，学界却不甘寂寞，年轻一代也不愿忽视曾经有过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虽说不再提文革，但对文革的局部片面的否定做法，却是很多政策制定的依据，例如，全国人大作决议，取消了文革有过的、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

因此，既然因种种原故，文革的历史全貌真相尚不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对文革有历史兴趣的人，意图从文革历史中总结出一些有益教训的人，恐怕就得注意：

（1）要有耐心，慢慢等待那被尘封的历史画页逐渐展露。历史不可永远被人盖住，它总会要从各种机会中向人们展现。

（2）对文革历史问题，不要忙于下结论。因为，由局部片面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往往是靠不住的，有些甚至会是错误的。

——写于2003·5·22

◇ 来源：《新世纪》网站

~~~~~

【往事如烟】

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 冯骥才

今年五月间，我对几十名非文革经历者——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根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进行采访，询问他们对文革的印象及其由来，以及每个人的看法。年纪最小的为十二岁，最长的为二十岁。一律照实记录，摘其要点，公布若干。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新一代人对文革的了解程度和认识状况，也能窥见当代青少年价值观念之一斑。

排列按采访先后为顺序。

方××（1976年出生，20岁，男，大学二年级学生）

我喜欢历史，注意过文革的事。

文革对我们连记忆也没有，所以只有理智地去想，没有任何感情的东西。没有恨和爱，只有好和不好。对文革，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积极的东西。如果文革不是那么凶，那么混乱，走向极端，左的东西也难失去统治地位。改革正好拣了文革的便宜。文革对中国历史还是有功的。当然这不是文革本来的意思。目的和结果正好相反。

皮××（1978年出生，18岁，女，高中三年级学生）

我不愿意了解文革，我一听爸爸妈妈说文革就烦。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苦过，但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你们生活在现在，也不是生活在过去。你们是不是想得到我的同情，我同情你们呀，可同情又管什么用？难道是怕文革再找你们来？你们到大街上转一转，看看文革在哪儿？哪儿还有一个红卫兵，还有一张大字报？到处都是私人买卖，还能把他们当资本家批斗吗？我爸爸妈妈听了直摇头，说我不懂，我说他们有“恐文革症”。

赵××（1977年出生，19岁，男，工人）

中国不会再发生文革，现在的人市场观念特重，为了钱人心都散了，谁也甭想把人们再号召起来，除非用钱才能把人吸引住。文革倒是注重精神，听说那时上上下下为了什么事，都感动得流泪，特真诚，真棒！如果说这些人为了私欲互相残害，我看不可能。还有就是样板戏比老京剧好看，也蛮感动人。如果说“彻底否定文革”，我看样板戏首先就不能否定。

张×（1977年出生，19岁，男，大学一年级学生）

我对政治兴趣本来就不大，对文革更不关心，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我的文革印象大多是听长辈说的。文革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对我们却没什么影响，跟我们的生活更没有丝毫关系。如果叫我回到文革，我不反对，甚至很有兴趣。一是我觉得文革怎么可怕，二是可能会感觉

很新鲜，我想切身感受一下。是的，我有兴趣。

柳××（1984年出生，12岁，女，小学五年级学生）

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一个大坏蛋打仗的故事！

孙××（1976年出生，20岁，男，出租汽车司机）

文革咱没见过，但比现在强！现在的人要多坏有多坏！您是工薪阶层，没钱去歌舞厅对吧！那儿，狂啦！天上飞的、草里蹦的、河里游的，有嘛吃嘛！就一样东西不吃——屎！那些三陪小姐，一晚上到好多家歌舞厅去赶场，我当然知道她们了，我拿车拉她们呀！她们就在我车里掏出小镜子抹口红。一晚上赚的钱比您半年赚得多，信吗？都是那些大款拿票子砍给她们的。您说文革中他们能这么狂？您说嘛？问我赚多少？一天一百块。您说嘛？文革时也算资本主义也得挨斗？那就斗呗！反正得先斗那些款爷们！只要斗他们就行，先杀杀他们的狂劲再说！

万×（1979年出生，17岁，女，高中二年级学生）

目前，我们的历史课正讲文革，课本内容不具体，根本无法理解文革，我没兴趣，能应付考试就行了。听妈妈说，文革时社会很乱，好人遭陷害。我想，毛主席也没能力了，不然他怎么会管不了“四人帮”呢？妈妈还说，那时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我想，文革也不错，不用再上课了，热热闹闹，批斗老师，多有意思！我们同学还说呢，怎么不文化大革命呢，那就不考试了。我听人说，文革把中国的发展推迟了一个世纪。我也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一个世纪是怎么算出来的？没法核对。

马×（1979年出生，17岁，女，高中二年级学生）

文革给我的感觉是：很神秘又很复杂，有点恐怖又有点可笑。听说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做得和盘子一般大，不能戴，只能用铁丝挂在脖子上，这些人不是疯子吗？还有，我爸爸说他去北京见毛主席，是骑自行车去的，他怎么会这么傻呢？如果是我，见谁也不会骑自行车去呀——这叫我真是不能理解。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变态？我想多了解文革，不知从哪里去了解。

傅×（1980年出生，16岁，女，初中三年级学生）

文革时我爸爸才十岁。我的印象多半是从电视剧里看到的。比如《年轮》《孽债》等。我觉得文革很可笑，又可气。穿衣服补丁愈多愈革命，人有知识就挨斗。我想将来再也不会发生文革了。谁也不能一声令下，大伙就干。我们得动脑子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如果我不同意，还会反抗呢！

常××（1983年出生，13岁，女，初中三年级学生）

我对文革太朦胧。我爸爸在内蒙做过知青，但他从来不谈那时的事。课本上没有这些内容，同学们也很少谈到文革，大家都不清楚，跟我们也毫无关系。只有一次，奶奶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头发被人剪了，就戴了一顶帽子把秃头遮住，爸爸问她怎么回事，她不肯说；爸爸叫她摘下帽子，她就哭了。我对文革有点怕。就这些。

何××（1977年出生，19岁，女，大学一年级学生）

那个时代有激情，人都很真诚，非常迷人！我想象不出文革具体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五四运动？那时也游行、演讲、斗争，也分两派，也打人，但那是一种为了信仰的战斗呀！我喜欢这种生活，哪怕这真诚被欺骗了也心甘情愿，因为我是真的，现在无法生活得那样富于激情了。

刘××（1980年出生，16岁，男，高中一年级学生）

我知道文革坏，我听家长讲的，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反抗？我对爸爸说，他们凭什么拿你东西，凭什么打你，你为什么不打他呢？要是我就和他们拼了。如果再有文革我才不怕呢，我也“打砸抢”，把害我们家的人都收拾了。

林×（1984年出生，12岁，女，小学五年级学生）

我不知道文革是哪一年的事。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文革时打人我知道，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吧，打的是日本鬼子吧……不，是蒋介石反动派！我听说过“四人帮”，有毛主席的媳妇，还有林彪，别的就不知道了。

田××（1979年出生，17岁，男，高中二年级学生）

都说文革搞个人崇拜不好。我看挺不错。一句话那么多人响应，人心齐，能干大事情。现在缺的正是这种精神支柱，很少有人再说起民族国家这类高尚的话。据说文革时干活拼命，下班自愿不回家，现在太看重钱了。可是我并不懂，为什么对文革好像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块就是课本上文革的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这些事：“千万少说！”

郭××（1977年出生，19岁，职工）

你设想一下，假如把文革从历史上去掉，那么文革前的社会和文革后的改革时代能连在一起吗？这就说明了文革的重要。不要轻易否定一段历史。我没看见过文革，但现在人人都说那时候没有吸毒和嫖娼，是吗？所以说，历史不是 $1+1=2$ 也不是 $2-1=1$ 。文革中有好东西，甚至有很好的东西。

谢×（1978年出生，18岁，职校学生）

文革的问题是政治关系超过一切关系，现在的问题是金钱关系超过一切关系；文革干活不计报酬，现在是不给报酬不干活；文革是“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是谁说了也不算。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文革和现在各取一半，放在一起。

宇文×（1979年出生，17岁，男，高中二年级学生）

我对文革的印象主要是从爸爸身上得到的。他在文革中戴了好些顶“帽子”，可能由于他是知识分子。我觉得他虽然不幸，但不像英雄落难时那么崇高，他似乎很委屈、很窝囊。他偶而谈到文革，总是叹长气，我也没办法。我认为任何时代，都不能叫人委屈，叫人难受。

张×（1977年出生，19岁，男，职员）

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时生活很苦，大学毕业工资

才五十多块钱，但又有人说那时的物价低，一斤肉不到一块钱；有人说文革时随便打人，社会混乱，也有人说那时官员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还有人说毛主席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些话全对，我听了就更糊涂了。

于××（1978年出生，20岁，女，打工妹）

在农村听说过文革，不多。庄稼人对政治没兴趣，没心思打听，不碍吃喝就行了。文革好像是反左吧！别的就不知道了，知道了也没用。

贾××（1977年出生，19岁，女，农民）

文革就是斗坏人、斗地主呗！不过老地主们早死光了。现时下，人们有的做买卖，有的还雇人干活，不也成了地主！文革还革谁？以后大伙都有了钱，谁还会闹那种事。愈穷才愈革命呢！

竺×（1976年出生，20岁，女，大专二年级学生）

长辈很少和我们谈文革，大概没有共同经历，也没有共同语言。对于文革，我认为毛主席的初衷是好的，他让知识分子下乡，想支援文化落后地区，但适得其反，耽误了很多人才。那时候，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到祖国第一线，奋不顾身，这样做对国家好，可是失去了自我价值。文革对我们一代的影响是间接的，但还能感觉得到，比如人际关系复杂、相互不信任等等，这和文革时候相互揭发和诽谤有关。我认为文革坏处多于好处，我为自己生在现在感到庆幸。

□ 原载《一百个人的十年》

~~~~~

## 【童年纪事】

### 众神的嬉戏

• 朱大可 •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

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轻盈得像。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嚎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击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嚎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斗，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噪中化成焦炭。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像。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了我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凡而伟大的一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

跳蚤市场上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音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一些古怪的联络暗语，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在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涎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

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 原载《世纪中国》网站

~~~~~  
【亡灵祭坛】

（编者按：陆兰秀于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残酷处决。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的《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收入“陆兰秀其人其事”“陆兰秀劳改日记”“陆兰秀狱中遗文”，以及“批斗和审讯纪录”等内容。由前江苏电视台台长丁群编著，由钟沛璋作序，丁东写跋。以下为该书的序言和跋。）

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
——读《陆兰秀狱中遗文》

• 钟沛璋 •

一个民族不应忘却自己的光荣，也不应忘却自己的羞耻。前者能给人以鼓舞，后者能激人奋进。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都知道“9.18”是国耻。这种耻辱感，终于汇成全民抗战的伟大力量。

但是有人却认为，“反右”、“文化大革命”、“6.4”等，都是“敏感问题”，都应该赶快忘却，在一切传媒中消失。认为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旋律”只能是歌功颂德。在这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全民得了健忘症，才能国泰民安。

1940年加入中共的陆兰秀是又一个张志新式的烈士。因反对“文革”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7月4日被处以极刑。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

一位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参加过新中国建设，勤奋博学，通晓四国外语，一贯勤恳工作的共产党员，因为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竟被判为“反革命”，枪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场上。对这样的羞耻，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没有因为考虑“主旋律”而予以忘却。也没有象当年主管宣传的邓力群对待另一位烈士王申酉的报导那样：“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见金凤：“《王申酉文集》序：十年生死祭”，载本刊zk0210a——编者）1978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就为这位杰出的女共产党员——陆兰秀初步平反昭雪。1982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199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捧读没有被遗忘的陆兰秀狱中遗文，仍能强烈的感到陆兰秀燃烧着的革命热情，感到陆兰秀明澈的思想照耀我们今天仍在探索前进的道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和遗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遗产。

陆兰秀树立了我们今天、我们后代都应该学习的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

当刘少奇一夜之间被戴上“叛徒”、“工贼”的帽子，要被打倒时，陆兰秀站出来说：“不！”她坚决反对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当广大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时，陆兰秀说：“不！”她尖锐批判对干部的法西斯审查方法，要求恢复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当现代迷信盛行，把毛泽东晚年极左的理论奉为神明时，头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遭受残酷迫害的陆兰秀，仍然针锋相对地指出：“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她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世界已整个颠倒着”，她相信颠倒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重新颠倒过来。她多次致书毛泽东，要求他纠正错误，解放全国人民于“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她责问毛泽东：“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陆兰秀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她说：“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她多次致书全国人民，要求大家自己解放自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她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陆兰秀的“劳改”日记和狱中遗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从被扭曲，到觉醒，到奋起抗争的历程；记录了用她通读马恩全集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和掌握的历史知识，全面地批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所作出的贡献。陆兰秀用自己的鲜血向我们指明了探索真理的道路。

当多少人或是摇着“红宝书”热衷于群众自己斗自己的派仗，或是向伟大领袖“早请罪，晚汇报”，苦苦检讨自己的时候，陆兰秀清醒地呼喊，要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还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样的现代迷信。陆兰秀面对专横的造反派，就明确表示，对毛主席的话要具体分析，谁掌握真理，就应该听谁的。

经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才被彻底否定。在这以前的十一年，陆兰秀在她遗书中，就明确指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

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比起许多同时代的人来，陆兰秀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先觉者。她为什么能够先知先觉，而且如此勇敢、坚强呢？首先是因为她无私无畏。她在给她丈夫的遗书中说：“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由于无私无畏，陆兰秀就一往无前地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她在遗文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际上，屈原终其一生，什么也没有求索到，因为他所索的东西，当时中国不存在！死者以矣，生者如何！我恐怕也将终我一生而求索下去吧！”

陆兰秀这样无私无畏，是因为她坚持真理。她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她不把它当作迷信或教条。而是用革命理论的科学思想来指引自己的路。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就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陆兰秀狱中遗文》得以出版，我希望大家都能认真读读，认真研究。我也希望那些把“文革”看成是“敏感问题”而不敢碰的人们，也都来读读这份“文革”遗产。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让大家都象陆兰秀那样觉醒起来，懂得思想，懂得追求，共同去创造美好未来好呢，还是让大家“健忘”，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好呢？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载负十几亿人民的这条中国大船，将何去何从？愿所有掌握着航向权力的水手们，勇敢地担起历史的重任，正确把握好航向！

□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

丁群和《陆兰秀狱中遗文》

• 丁 东 •

今年夏天，广电部表彰该系统的老人，前江苏电视台台长丁群先生来京，我们终于得以见面。

丁群先生文革前是省报记者，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任苏州市委秘书长。张志新式的思想烈士陆兰秀，就是在他一手推动下得以昭雪的。以后，他又写成《陆兰秀传》一书出版，并由李锐先生作序。

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

陆兰秀生前是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她40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党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她从事过理论工作，较为系统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都促使她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产生了怀疑。最初，她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曾经寄希望于毛泽东、林彪，想通过上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但她的努力，马上招来残酷的迫害。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迫害不但没有吓退她思考的勇气，反而促使她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在失去人身自由的严酷环境里，她明确地提出，文革是历史倒退，是毁灭性的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冒死呼吁立即结束文革。对于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说：“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根寻源，她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问题出在毛泽东身上，出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她在一篇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并且，她寄希望于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出来结束这场灾难。可以说，陆兰秀是文革中最早的批判者之一。可惜历史只给了她两年多一点的思考时间，从1968年表达独立的见解，到1970年7月4日，便被残酷地枪杀了。

我因为研究民间思想，很想与丁群先生相识。接下来是李锐先生告诉我丁群先生的地址，于是我和他建立了通信联系。不久，得赠他写的新著《刘顺元传》，读后颇受教益。刘顺元是当过中纪委副书记的老革命。抗战胜利后在大连主持工作时，曾抵制苏军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被斯大林所忌恨。以至于数年不能公开担任领导职务。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刘少奇才提议重新启用他担任江苏省第二把手。我想，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应当加以传播，于是让当时参与《百年潮》编辑工作的妻子向他约稿，专门介绍刘顺元这段往事。

同时，丁群先生又整理出《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并让我一起寻求出版机会。

我通读书稿，感到十分沉重。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独立思考而坐牢杀头的不止一个人。像遇罗克、张志新式的思想先驱，曾经出现过一批。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国内报刊曾经报导过其中一些人的事迹。以后，他们留下的言论也曾得到或多或少的整理出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这样的思想先驱者留下的文字和言论得到全面的整理出版。陆兰秀留下的这些文字和言论，绝大部份产生于牛棚和囚室。这是最没有思想自由和表达权利和环境。但她仍然顽强地表达，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十年过去了，回头看这些血写的文字，我们一方面为陆兰秀的精神而感动，一方面为思想专制的血腥而震撼。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的思想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文化大革命期间，颁布了“公安六条”这样以表达思想致人死罪的政策，并开动国家机器实施，使中国公民的思想自由受到空前的践踏。陆兰秀就是殉难者的一个代表。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陆兰秀说，普罗米修斯把上帝带来的火偷给人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而终不悔；我非普罗米修斯，说出这些可能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话，受到人们的惩罚也是终不后悔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兰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仅仅是一个开始，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免受到环境的局限。长达十年的文革，她仅仅经历了三年多，就被野蛮地杀害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到文革的全部过程和全部恶果，也没有来得及更加系统地挖掘文革的背景和原因。苏州不处于全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可以得到的信息有限；陆兰秀早早就被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机会和志同道合

者讨论交流。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思想者，虽然处境也很艰难，但或者有交流切磋的机会，或者有较多的信息来源，因而产生了更见条理和深度思想。如果在一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里，人们可以要求思想者的成果，更加精粹，更加深入，更加缜密，但考虑到陆兰秀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思考和表达，后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苛求。她的每一点先知的思想闪光，都应当得到后人的珍视。

愿丁群先生编的这本好书，及早和公众见面。愿我们的出版环境，变得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播。

□ 《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

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 陆兰秀 •

这几天，满城敲锣打鼓，满街都是大幅标语，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而且农民至今还是集体所有制。

列宁早就下过结论，农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虽然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但他们自身还是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何况，将来工业的发展，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特别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工人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农业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能左右世界局势的国家；而只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相剥相，成为他们的变相殖民地，永远不得翻身。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工人。中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工人人口占多少我不了解，但数量肯定是不算多的。如果前三届毕业生都分配到工厂、矿山学工，到现在多是相当成熟的工人或徒工了。

而现在他们却都在农村。以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而发生这种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

有人认为，把大批城市人口疏散下乡，是消灭城乡差别的一种简捷途径。我并不反对把城市的闲散人口疏散下乡；但如果把大批知识青年疏散下乡，试想一下是什么情景呢？农业人口增多了，工业人口相应地减少了，农业装备也就更困难了，农业就只好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

形成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的畸形发展，工农业的矛盾就更突出了，城乡差别能从本质上消灭么？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工业不断发展，突破城乡界限向农村渗透，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所代替，工业面积日益增大，农村面积日益缩小，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工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矿山，最后剩下必要的农业，被强大的工业装备起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这才最后从本质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甚至消灭了工人和农民思想感情上的差别。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有一百万俄国农民，被德军俘去送到德国的工厂做苦工，结果却为苏联培养了一百万产业大军，在苏联的工业化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旧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大批的、数以百万计的、成熟的产业军，只有靠我们自己培养。现在又到了应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了，还有很多机关单位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说，从战略出发，城市应该疏散人口，那么，是否可以让这些青年跟随工厂一起迁移呢？如果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才把他们送到农村中去，请想想，每人每月 15 元生活费，只相当于四美元，世界上那里去找这么廉价的工人呢？何况，他们的劳动还能产生价值？各宣传机构，是否也能考虑一下宣传的内容呢？记得过去报纸上还对已分配到工厂的学生坚决要求下乡进行表扬，这种宣传方向就更不对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向这里的负责同志写过汇报，希望能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但下面的意见不一定能及时反映上去；即使反映了，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容易引起注意。这几天在锣鼓喧天的报喜声中，我不能不给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们写这封信，要求大家一起，本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过，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不应无条件服从。又说，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不管他是扫大街的，挖煤的，还是挑大粪的。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增加一些工厂的负担，但工人同志们想到国家发展的前景，是会乐意承担这样的培训任务的。各地农村的同志们，为了同样的目标，也是会乐于让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工厂里去的。而且他们自己的青年，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去的。

当前，负担大批知识青年的生活费用，国家可能有困难。关于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想革命的家长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暂时再继续负担一段时间子女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谅解的。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政策都是反面教育。毛主席向来是允许大家独立思考的。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一个人说话不一定有效，大家一起来做工作，效力就大了。毛主席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

陆兰秀 1969年11月22日

附言：

这封公开信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各革命家长、各革命师长、各级领导同志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意见是正确的，就请这样做，这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的；如果你们认为

我的意见不对，而你们原来的做法是对的，我就收回这封信，保留我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各人可以独立思考，但真理只有一个，将来总有一天，不同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到那时，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可以共同研究其他一系列问题，并把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求得解决。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迟一点早一点关系不大，只是早解决困难少一点，迟解决困难多一点罢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们印发了一些毛主席的讲话摘录，证明毛主席很早就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的民主制和国家机器的性质等思想，都没有贯彻下来。我想，这一则因为都是新问题，干部水平有限，吃不透毛主席的意图，执行起来总是有距离；二则人民没能真正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这些讲话都已流传于全国，毛主席允许人们独立思考，人们也没有养成这种民主习惯。所以长期以来，凡事总待毛主席决定。这样下去，全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学习使用民主这个武器呢！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诸多的几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例如：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等等。这么好的礼物，人们在世界上那个国家见过呢？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曾对人民说过，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只是它做的事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是“被统治者”。我这是从实质来说的，在文字上，是“被领导者”。

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在社会上居于什么地位，是被统治者，还是世界的主人。毛主席给了人民最珍贵的礼物，给了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叫人民自己起来做世界的主人，而把国家机器看成加工厂。毛主席是真正的人民队伍里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把上方宝剑送给了人民，而自己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应该不辜负毛主席的深情厚意，赶快接过来并使用起来。如果毛主席给了，人民不接不用，或者不敢使用，象叶公好龙一样，天天喊民主，真的民主来了，又害怕起来，有困难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叫毛主席怎么办？他就只好耐心等待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甚至加强反面教育，迫使人民觉悟到民主的重要性。

有些英雄们写了一些美丽的诗句，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是人们用以表达对毛主席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向各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前进，人们应该紧跟那一位毛主席呢？万一将来战争发生，失去和毛主席的联系，人们怎样应付突发事变，又怎样独立作战呢？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有人说，跟着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七亿人民尽舜尧，是毛主席的最高理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毛主席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我提出我的想法。这封信是写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也是写给全国人民的。因为哪家没有家长，哪家没有子女呢？要求全国人民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在真理面前不要退缩。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当他看到人民开始运用民主的武器行动起来时，他一定高兴。人民开始觉醒了，地平线上就出现曙光了。

□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成家出版社出版。摘自《新世纪》网站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